

一个浦东人的联合国生涯

□徐书云

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,本报编辑部特邀与联合国结缘40载春秋的徐书云老人,听他讲述一位老浦东与联合国的特别故事。

75年前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诞生了联合国。我大半辈子,有幸跟联合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谨以一些琐忆和感想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。

从初识联合国到半辈子的交道

1950年,我在南汇大团小学上学。一天,吴剑平老师给我们上课,他愤慨地说,美帝打着“联合国军”的旗号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,中国奋起抗美援朝。从此,在我年幼的心灵里,记下了联合国这个名字。

1961年,我从南汇中学高中毕业。一位考上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长回母校玩,他说陈毅是他们院长,陈老总说了,越来越多国家跟中国建交,中国迟早要进联合国,同学们将来大有作为。也许是“联合国”三个字触动了我哪根神经,第二天,我便找班主任成祖义老师,把已填妥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国际关系学院(即后来的外交学院)。

待我进大学学了战后国际关系史,总算弄清了联合国的来龙去脉,知道战后冷战期间,美国操纵联合国做了一系列错事,还长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。1964年1月,戴高乐将军造了美国的反,中法建交,引起连锁反应,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局面。

1971年10月26日上午,我正陪外宾在北京民族饭店大厅休息。突然从电视机里传来播音员激动的声音: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!顿时民族饭店大厅里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决定了我开始从事联合国工作的生涯。两天后我被调回外经部筹备联合国会议,不久又奉命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5年。1977年回

国协助联合国机构设立驻华办事处,并参与首批联合国援华方案的制订。1982年应聘到联合国工作,从项目官员逐级晋升到正司长,还到伊朗、孟加拉和俄罗斯出任过联合国代表,退休后多次被联合国返聘,粗算下来跟联合国打了40年交道。目前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,从事联合国问题研究并协助国际公务员培训。

千里之行,始于浦东

1972年8月,我从日内瓦出席联合国经社回来,组织上通知我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,并要我与乔冠华率领的代表团同行。经乔团长批准,我先回浦东两天向父母辞行,然后在约定的时间到虹桥机场与代表团会合,乘航班取道巴黎飞纽约。在大团高高高兴兴地与全家团聚了一天。临行前母亲在院子里抓了一把泥土,用手绢包好塞进我口袋,说故土会保我一生平安。那时南团线和沪南线路窄车慢,我一路心急如焚。到十六铺好不容易拦到一辆摩托三轮。开车的师傅听清情况后二话不说,载着我开足马力,直奔虹桥机场。这位师傅艺高胆大,不时操着很重的苏北口音与我交谈。“你到联合国开会,代表我们中国,了不起呀!”“你认得乔冠华?我跟伊是老乡,苏北盐城建湖。”……当摩托三轮提前到达机场时,我才松了口气。40年过去了,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师傅那番激情言语。

联合国里三阵“中国风”

中国重返联合国后,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第26届联大首次发言。那天,大会场内挤满了人,争听来自中国的声音。乔冠华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,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帝、反殖、反霸和反种族主义的主张,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则,并提出联合国的事情要由所有会员国共同来管。乔冠华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,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大呼痛快。一股新鲜的“中国风”刮进了联合国,令人振奋。

1974年4月,毛主席亲自决定派邓小

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。他的传奇人生使他走到哪里,哪里的人们就热烈欢呼鼓掌,向他致敬,联合国里再次刮起一阵“中国风”。邓小平在特别联大讲话那天,我负责安排给记者分发邓小平发言稿,只见会场座无虚席,盛况空前。邓小平阐述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三个世界的理论,表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,永不称霸。中国将同世界各国,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,为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而努力。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。

第三阵“中国风”是2015年9月,习近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庆典和联合国发展峰会时掀起的。我当时恰巧正在联合国总部介绍中国民间组织情况,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习近平主席高超的多边外交的风采。习近平主席提出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理念,阐述了中国新时代外交的一系列主张。习近平主席主持和出席了五场会议,宣布中国将提供20亿美元设立“南南合作援助基金”,设立10亿美元的“中国/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”。许多国家代表说,习近平主席的这阵“中国风”给联合国带来了厚礼,带来了希望。

从会费看中国实力的提升

凡联合国成员国,每年都要给联合国交会费。会费分摊比例的确定,依据成员国的GDP/GNI、人口数、支付能力等诸多因素,每三年调整一次。大家知道,《毛主席语录》里有一句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的话,“较大”两个字英文用的是比较级“greater”,于是中国代表在预算委员会上就表示:中国打算分两步走,把应缴的会费比例从4%增加到5.5%,再从5.5%增加到7%。没过几年,我们发现联合国预算滚雪球般地增长,对我国很不利。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回国时,向周总理作了请示,之后我们就通知联合国:中国会费稳定在5.5%,不再增加。这是中国向联合国交纳会费的第一个台阶。

再后来,当时财政部派到常驻团工作的王连生,叫我同他一起仔细研究联合国计算会费的标准,通过代表团向国内建议按规定向联合国提供经济、社会统计资料,终于推动联合国依照支付能力原则重新调整了中国的会费比例,将1980—1982年的比例下调为1.62%,1983—1985年为0.88%,1986—1988年甚至下调到0.79%。这是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的第二个台阶。

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,近20年来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快速增长。2000年前,中国交纳会费比例才0.995%,2001年起每隔3年便从1.541%、2.053%、2.667%、3.189%、5.148%、7.921%节节上升,到2019—2021年度,增至12.01%,首次超过日本,名列第二。中国对联合国维和经费贡献率2019年也已达15.22%(5亿美元),也是名列第二。这是中国交纳会费的第三个台阶。

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大幅增加,彰显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能力和担当。

国礼“世纪宝鼎”

联合国总部陈列着中国政府赠送的四件礼物。第一件是宽十米、高五米的巨幅“长城”艺术壁画,悬挂在二层代表休息厅的墙上。第二件是陈列在三层的“成昆铁路”象牙雕塑,生动表现了铁路工程的艰巨伟大。第三件是中国政府在1995年为联合国成立50周年赠送的“世纪宝鼎”,它高2.1米,重1.5吨,雄壮凝重,坐落在联合国花园的草坪上。第四件是2015年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的“和平尊”。其中的国礼“世纪宝鼎”是地地道道的“浦东策划”、“上海制造”。

它的诞生,可谓无巧不成书。1994年春,我在上海与南中同学王亚仑不期而遇。几天后,王亚仑给我发来传真,称他任副主编的《特艺世界》杂志社,希望请联合国秘书长为其题词。后来经我联络,加利秘书长果真写来一段祝词,上海的朋友们喜出望外,大受鼓舞。不久我出差亚洲,顺道去浦东看望老母。王亚仑携朋友

赶到大团,称为感谢加利秘书长,打算研制青铜重器“世纪宝鼎”,为明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献礼。我被这一大胆而美丽的建议所吸引,答应跟联合国有关部门联络探讨,并给认识的外交部王光亚司长写信,传达了上海的建议。钱其琛外长对民间发起、以国家名义向联合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主意很赞同,遂签署上报国务院。1994年8月,国务院批文正式同意由上海研制“世纪宝鼎”。1995年10月21日,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大会的国家主席江泽民,出席了向中国向联合国赠送“世纪宝鼎”的揭幕仪式。事后,上海市开了庆功会,为表扬我的穿针引线,给我颁发了一张奖状,并赠一只重12.5公斤的“世纪宝鼎”子鼎。

故乡浦东,你让我魂牵梦萦

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春节招待会上,我遇见联合国中文审校宋宝尊,交谈几句便相互认定必是浦东同乡。原来他是新场人,上世纪40年代来美留学后未曾回过国。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从此宋宝尊见到我就有说不尽的话。后来我们一起替南汇在争取外资方面做了些事。1986年春节过后,当时已83岁高龄的大团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王良仲老先生不辞辛劳访美,途经纽约时会见了许多来自浦东的华人,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”,他们聆听王老的讲话,浓浓而亲切的乡音一下就拉近了他们跟祖国、家乡的心灵距离。

明年是我从南汇高中毕业60周年,同学圈里已有好几位提议“明年春水共还乡”,我即刻点赞支持,我写道:“1961届南中三(四)班的集结号吹响了!让我们再次相聚在魂牵梦萦的故乡浦东和母校南中。”我还建议大家届时去看望母校明年的高三(四)班的孩子们,他们比我们年轻了一个甲子,比当年的我们更幸福、更有前途。我想鼓励号召更多家乡浦东青年,将来学有所成,加入国际公务员队伍,献身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事业。

回不去的茅草屋

□孙韶峰

小时候,我家乡下的老房子是一层土坯结构的茅草房,屋顶是用稻草盖的,屋檐有一人多高,若蹦起来还能触碰到陈年稻草,但屋脊约有四五米高,里面层高空间宽敞,房梁上挂满了各种篮子。每年稻谷收上来后,把稻草晾干,父亲便要上屋顶铺一层新的稻草,有时也铺茅草或小麦秸秆。

有一次,趁父亲还没搬走竹梯,便偷偷爬上屋顶,那是我当时爬得最高的建筑,感觉离天空近了许多。我站在屋脊环顾四周,人畜家禽均在我脚下,极目远眺,一马平川。我突然想尝试一下飞檐走壁的样子,才蹦了几下,人就陷了进去,被卡在茅草里,下半身已腾空,两脚拼命蹬踏,双手紧紧抓住房顶上的稻草,生怕掉下去。这时,我感觉屋内有人抓住我的脚硬往下拉,我被吓得哇哇大哭,原来是父亲接住了我。

茅草房冬暖夏凉,经济实惠,尤其寒冬酷暑,屋内屋外温差明显。冬天,外面冰天雪地、寒风呼啸,屋内温暖如春,家的感觉特别温馨。茅草由于日晒雨淋很容易腐烂,一旦下暴雨,漏水没完没了,家里人搬出所有能盛水的盆、桶及坛罐来接水。要是半夜里下大雨,盛水的大盆小桶一会儿就溢满,不停地把水倒掉再来接,全家人要忙活一个晚上。后来,父亲在茅草房上面加盖了瓦片,家里漏雨的概率低了,但每隔几年还是要重新翻修一下。每到修缮时,我总在下面扶着梯子,眼巴巴仰望着屋顶上的父亲,希望父亲能在茅草里发现几只鸟窝,然后小心将鸟蛋或雏鸟递给我。

每到夏季,茅草房里蚊子特别多,蚊子密密麻麻,尽管睡在蚊帐里,耳边还是能听见蚊子的嗡嗡声,夜里蚊香熏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家里的老鼠也多,晚上总能听见它们吱吱的打洞声,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便要拿个铁勺打些耗子药回来,但夏天死老鼠的味道很难闻,有的甚至找不到它们死在什么位置。后来,祖母从亲戚家抱来了两只小花猫,我从没见过它们是否吃掉了老鼠,只听见它们每天喵喵叫的叫,晚上睡觉果然听不见老鼠的吱吱声了。

夏天的傍晚,家里的墙壁上还能发现一些壁虎,它们在墙上爬来爬去抓蚊子吃,虽然样子很难看,但它们不咬人,见人就跑。说到吓人的是蝙蝠,白天倒挂在屋檐下,样子及其丑陋,傍晚时分突然飞出来吓你一跳,但不会撞到人,有惊无险。最担惊受怕的是,家门口经常有赤练蛇盘踞在大青砖上,样子很恐怖,走路先看脚下,赤练蛇是一种微毒蛇,被咬轻则浮肿,重则有生命危险。屋顶上的鸟窝和老鼠气味也经常引来花蛇。有一年夏天,我抬头发现正梁上卧有一条近2米长的大花蛇,吓得屁滚尿流,大呼小叫直往外逃跑,和进门的祖母撞了个满怀。祖母淡定地说:“家里的蛇不咬人,不用怕,也不要去惊动它,更不能打死它,或许它是我们家哪位先祖来光顾。”祖母口里念念有词,她的话让我瞬间毛骨悚然。

春天里的茅草房才是最值得回味的。天气不冷不热,油菜花刚开,引来了漂亮的蝴蝶和蜜蜂。茅草房的土墙上,被蜜蜂们钻成一个个小洞孔,蜜蜂从油菜花田里吸饱了花粉,酿成了蜜回来,身子肥嘟嘟的,振动着翅膀从洞孔里出进进出。我用一根细细的竹签,再拿一只小瓶对着洞口,用小竹签伸进洞里撩拨,蜜蜂受不了,就乖乖地从洞里出来,正好钻进瓶里。那时候嘴馋,抓到的蜜蜂拦腰撕开,在它的尾部挤出金黄的蜜,用嘴吮吮,有一股甜甜的蜜汁。有时候我也被蜜蜂尾部的针刺扎到手或嘴,被蜜蜂螫过的嘴唇渐渐肿起来,但一会儿就不疼了。若是遭到黄蜂攻击,被螫的部位立即肿胀起来,疼上二三天才可褪去。

后来,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,先富起来的农民把茅草屋改为砖瓦房,楼层也从平房改造成二层楼房,有的甚至建起了三层洋房。我女儿没见过茅草房,有一次巧遇景区里的茅草房,我告诉她老家的茅草房的故事,那里藏着童年的记忆。如今,住在商品房里,我依然怀念着那个简陋破旧的经常漏雨的茅草房,那种质朴、简洁、实用、复古的气息特别温馨,以及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童年,永远充盈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

映红的秋林水粉画

□刘育彬

箭镇,一个淘金梦

□叶永平

新西兰的箭镇,人称“淘金小镇”,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古定居点,有许多故事要向世间讲述。但,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,依旧是淘金者。

箭镇风景如画,坐落在箭河畔,一度是淘金热的现场。小镇保持着它的历史特色——有60多幢经修复的19世纪建筑。虽然,这里还有可能从河里淘到金子,但对当地人而言,淘金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。

从箭镇的故事,联想到《淘金记》。这是查尔斯·卓别林1924年的作品,也是他本人钟爱的一部作品。

《淘金记》讲述了一批贫困人士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,前往环境恶劣的美国西部去淘金。许多人失败了,不是被狂烈的暴风雪天气吓倒,便是缺乏坚定的意志让自己留在当地。而小个子流浪汉夏尔洛不畏艰险,留在了阿拉斯加,并且遇上了一系列有趣又惊险的事。最后,他幸运地成为百万富翁,并且抱得美人归。

这个完美的故事结局,似乎落入俗套。想当年的淘金者中,能有多少人有此

好运呢?这个比例,在淘金者的群体中,可能不会很高。但是,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

箭镇的历史,也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。2014年,据澳洲《星岛日报》报道,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家族,徐肇开后人,决心要运先人的遗骨返回广东番禺安葬。谁是徐肇开?原来他最先到美国旧金山淘金,之后转往澳大利亚,还在墨尔本开商店,1869年转往新西兰南岛。经过百多年的发展,其家族现有约600名后人。徐肇开家族在新西兰的“生根发芽”,可以说是华人在新西兰百余年的历史的一个缩影。回首华人在新西兰的“安家”路,是一段跨越一个半世纪,在逆境中拼搏、从屈辱中翻身的坎坷历史。

从淘金到安家,这是许多华人淘金者的梦想,也是他们筚路蓝缕的缩影。

据资料,新西兰最早一批华人来自广东,1865年踏上新南岛奥塔哥地区的土地。那一时期,在淘金的吸引下,一些华人或东渡加拿大,或南漂新西兰。然而,能够

衣锦还乡的只是凤毛麟角。由于疾病和贫困,许多人客死异乡。

为了让同胞落叶归根,1883年,新西兰知名华裔徐肇开出资运送230名矿工遗骨回国安葬。1901年,徐肇开本人不幸去世。次年10月,他的儿子租用英国蒸汽货轮“文特诺”号,打算运送包括先父在内的499名华人遗骨回家。

不幸的是,“文特诺”号在新西兰西海岸触礁受损,返航途中沉没。据说,有33具华人棺木被冲上海滩。当地的毛利人发现后,把尸骨和棺木埋在附近一座山丘。从此,那座山丘得名“华人山”。

当在箭镇的淘金者历史保护区,看到那些茅草屋,看到那些淘金者的遗迹,为他们当年那种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所震撼,也为他们的自强不息置死地而后生的不屈精神所折服。

淘金者如此活着,想必他们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。因为淘金梦,成为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

如今的箭镇,早已“无金可淘”。但,他们还有追逐中的“淘金梦”……